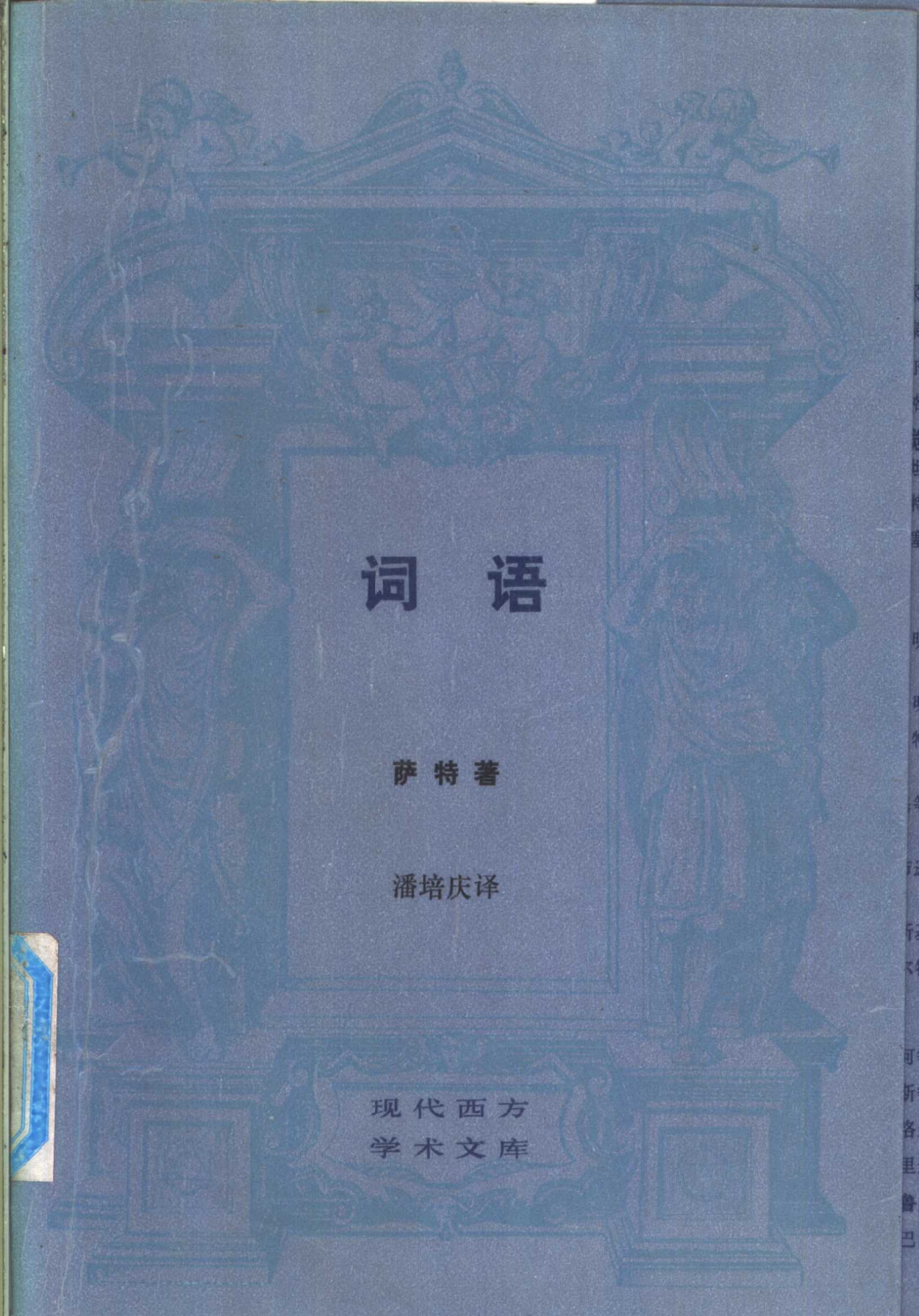




词语

萨特 著

潘培庆 译

现代西方
学术文库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

词 语

萨特著

潘培庆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袁 春

封面设计：庄 凌

S. P. Sartre

LES MOTS

Gallimard, Paris, 1964.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词 语

CIYU

〔法〕 萨特 著

潘培庆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50,000 字
1980 年 5 月第 1 版 198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定价 5.60 元

ISBN 7-108-00162-4/B·47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

主 编：甘 阳 副主编：苏国勋 刘小枫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晓	王庆节	王 炜	王 焱	方 鸣
甘 阳	纪 宏	刘小枫	刘 东	孙依依
杜小真	苏国勋	李银河	何光沪	余 量
陈平原	陈 来	陈维纲	陈嘉映	林 岗
周国平	赵一凡	赵越胜	徐友渔	钱理群
黄子平	郭宏安	曹天宇	阎步克	梁治平

本书责任编辑：杜小真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总 序

近代中国人之移译西学典籍，如果自一八六二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余年。其间规模较大者，解放前有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工作，解放后则先有五十年代中拟定的编译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规划，至“文革”而后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这些，对于造就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材、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支持下，创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至于介绍性的二手著作，则“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另设有“新知文库”（亦含部分篇幅较小的名著），以便读者可两相参照，互为补充。

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是所望焉。谨序。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1986年6月于北京

恶梦醒来是早晨(代译序)

萨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使回答了,也常会因为表述不当而失之偏颇。由于每个人都是由众多的因素构成的,因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一个人,这个人便具有不同的面目。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研究萨特,如从哲学、政治、伦理、文学等方面来研究,而描绘出他的这些侧面形象;我们也可以专门研究他的某一本书从而揭示出该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我们还可以按一定标准把萨特的一生划分成若干阶段,集中对某个阶段加以研究从而指出该阶段在萨特生活中所具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我们要对作为一个多元的总体的萨特进行研究,那么他有一部作品是我们不能遗忘的,这就是他的童年自传《词语》;萨特在《词语》中为我们研究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即通过词语来研究他。因为他的整个一生正是在词语的环境中,在与词语打交道的过程中度过的,“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它无疑也将以书结束。”从词语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归纳他的一生:开始是对词语的惊奇,继而是对词语的征服,然后发展到对词语的崇拜,并将之确立为自己的上帝,当他发现了自己的“文学神经症”后,他又抛弃了作为上帝的词语,恢复了词语的本来面目——一种人类文化的产物,最后他又在词语(或话语)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进入了词语的永恒。一部《词语》把萨特的思想,也把他的人生一分为二,在《词语》之

前，他生活在梦幻之中，从《词语》开始，他清醒了，觉悟了，《词语》即是他从唯心主义，从他所谓的“疯狂”和“神经症”中解放出来的标志。萨特在《词语》中分析了他的“神经症”的来源，或者说他解释了他何以会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的。他试图综合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的方法来剖析他的童年：即把他自己放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从而指出他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同时又指出他的童年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成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萨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他在战前还是个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人，那么战争则使他懂得了必须介入，想对生活，社会，他人，责任等抱无动于衷的态度是不可能的，因为逃避介入本身就是一种介入。萨特在德国战俘集中营里即开始以他的方式介入生活，他创作并导演了《巴理奥纳》一剧，暗中号召教徒与非教徒联合起来。出狱后他又立即组织了一个叫“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抵抗小组，并积极与共产党联系，想把该小组的抵抗活动纳入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虽然他的诚意并没有获得共产党方面的信任，可他还是以笔作剑，写了《苍蝇》一剧，以隐喻的形式宣传抵抗的思想。法国解放后，他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了社会生活：1945年，他创办《现代》杂志，意欲以其存在主义理论来剖析当今世界，并提出其存在主义的治理方案。他还想通过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来向人们展示当代英雄的形象，同时，他又撰写《道德》一书，试图在这个人不成其为人的时代提供一种可行的道德。1948年，他参加了革命民主同盟，直接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可以说，这时的萨特俨然就是手里拿着十诫下山来拯救民众的摩西——一位上帝的使者。然而这位摩西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如愿以偿，他的满腔热忱碰到了冷若冰霜的自在之物——具体的历史进程。实际上，自

萨特在其存在主义的介入理论驱使下走出书斋投身于现实的风风雨雨之中的时候起，他就不断感受到他的主观性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他在1948年创作的《肮脏的手》中就把实践与道德对立起来，前者是有效的，而后者却是虚幻的；就如人只有不介入才能保持其清白一样，道德在现实中也是难以保持其完美的，现实要求人们“弄脏双手”。1948年，他兴致勃勃地参加了革命民主同盟，可他在第二年便败兴而退，这一失败的经验使萨特感到自己在政治技术方面是个外行。1949—1950年前后，由于他意识到他正在《道德》一书中构造一种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学，于是他不得不中断了该书的写作。同样道理，《自由之路》也因为他本人在生活中遇到的矛盾而难以再写下去。他于1951年创作的《魔鬼与上帝》即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矛盾。他在该剧中“想探讨的是没有上帝的人的问题……因为在苏美之间，在某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很难设想我们时代的人……”。这段话表明了萨特的困境，即面对战后的冷战局面他有些无所适从了。这时不要说展示存在主义式的英雄形象，提供一种可行的道德，即使萨特本人如何对付现实，如何介入（参加革命民主同盟那种直接的政治介入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都成了问题。虽然他在感情上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又使他非常反感，然而在美苏之间一时又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这位主张自由选择的大师自己也面临了选择的困境。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国际局势更趋紧张。在萨特看来，一切都好像是在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之外决定的，更是他这样的作家无能为力的，这不能不使他这位雄心勃勃的介入作家感到痛苦。他只是通过他用词语创造的格茨这个人物才勉强克服了他在当时感受到但并没有解决的思想矛盾。五十年代初，他开始重读马克思主义

的经典著作,并开始思考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政治上他也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1952——1954年,萨特经历了一场危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使他对自已的经历作了必要的回顾,这时他突然看清了他的“神经症”。1953年,他决定写一部自传,试图找出其“神经症”的根源,对以前的一切作一次必要的清理以便有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词语》一书的由来。

我们在《词语》中看到,萨特的“人之初”是很不幸的。父亲在他降生一年多就死了,他自己也患了肠炎,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生病,他才九个月就被强行断了奶。父亲死后,身无分文的母亲只好带着他回到了她父母身边,开始了他在“一个老人和两个女人中间”的长达十年的孤独生活。萨特的童年是在文化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的外祖父是一位语言教师,家里拥有许多藏书。萨特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砖块”(指书),并羡慕地看着外祖父摆弄它们。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萨特就这样进入了这座文化的宫殿,他与词语这些人类文化的符号遭遇了,从此他便与词语结下了不解之缘。还在他不知拼写与阅读的情况下,他就向这些黑色的符号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半背诵,半辨读”地读完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流浪儿》等书。随后他开始接触高乃依、雨果、福楼拜、凡尔纳等作家的作品,由于他没有玩伴,他便把这些已故的作家看作是自己的兄弟。他尤其对拉罗兹大百科全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在他眼里,百科全书就是整个世界。他正是在书本、在百科全书中才真正开始了他的生活。整日里与词语作伴致使他萌发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词语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而现实世界只是词语世界的“摹本”而已。相对于百科全书中的人与动物,“动物园里的猴子就不是完美的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也不是完美的人”。以后他又开始了对词

语的进一步征服——写作。当他把想象中的事件写在稿纸上的时候，他也就把虚幻的东西变成了现实。这向他昭示了他的巨大威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词语的天国里制造种种事件，而这些事件一旦用词语表现出来，它们也就随同词语变成了绝对而获得了永恒。当萨特在外祖父的书房里装模作样看书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词语的超时间性：他正在看的那些词语早在他出生之前就不知被多少人看过了，它们曾看着他出生，也将看着他死亡，词语是永恒的，而人生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已。仅仅词语的这一特性就足以使萨特肃然起敬了。他心中暗想，以后也要象外祖父那样做一名文化的卫兵，写出传世之作，即使他短暂的生命结束了，他也将借助于词语而获得拯救；当人们翻阅他留下的词语时，他就会立刻摆脱虚无重新获得生命。

然而不管词语的世界是多么诱人，多么丰富多彩，可相对于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它总不免要大为逊色。仅仅靠词语本身的魅力是不足以使童年的萨特沉溺于词语而难以自拔的。不管萨特的外祖父如何溺爱他，称之为“奇才”，也不管萨特本人如何想象自己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渊博的知识和剑客的敏捷，可当他在卢森堡公园里看着那些活泼、健壮的孩子们在游戏时，他惊呆了，他不能不感到自己的矮小，而当他呆立一旁根本就不为人所注意时，他更觉得自己是一个“更低层次的人”。这时，只要能获准参加那些孩子的游戏，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为之感到骄傲的一切才能。正因为他无缘与真正的同龄人打交道，这使他丧失了一次又一次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机会。本来他可以在学校里与他的同龄人相处，可他第一次上学却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尽管他在上学之前就已读过许多书，但他在第一次听写练习中却败下阵来，因为“我是一个不知拼写法为何物的神童”。才上了一

天学，第二天便由外祖父从学校领回，他又一次回到了以前的孤独生活，也就是回到了词语之中。

萨特自幼丧父，用他的话说，他没有“超我”，这使他获得了自由，但他却因此缺少一个上帝，这又使他不知道什么是权利和义务。如他所说，丧父给了他一种不完全的“恋母情结”：由于没有人因他平静地占有他的母亲而向他挑衅，他因此便丧失了“进攻性”。他就这么不愁吃不愁穿地活着，他不需要干什么，也没有人要求他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来了。没有超我，这固然是一件好事，可这种人生却因为缺少一个目的而变得疲塌、懒散，使人萎靡不振，因为没有目的也就没有必然性，而没有必然性的人生却是一种荒谬的、没有存在理由的人生。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的人生问题。肚子总被填得饱饱的萨特感到，外祖父虽然宠爱他，可这并不就是他的存在理由，因为如果他不存在，外祖父同样会对别的事物，别的小孩啧啧称奇，没有他，外祖母、母亲还是这个样子，他的存在完全是偶然的，多余的，既没有人在盼望他，也没有什么事在等着他去完成。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大家都在做戏，萨特虽也在忙忙碌碌，跑上跑下，不时还有几句台词，可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在帮别人排练台词的跑龙套的角色，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这对他无疑是一个痛苦的发现，于是他开始寻找自己的使命。斯特罗戈夫的故事使他欣喜若狂，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沙皇的一道命令使斯特罗戈夫从虚无中诞生，他为此命令而生，也为此命令而死，而他萨特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命令。于是他做了下面这个白日梦，他想象着自己成了一个无票的旅客，别人都凭票上车（这无非是说别人都有存在的理由），而唯独他没有车票。可是为了求生存，他不得不偷偷潜入了人生这一列车。

他在车上睡着了，突然查票员把他摇醒，要他出示车票，他支支吾吾想搪塞过去，可查票员紧追不舍。萨特突然想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必须立刻改变自己的不利局面。情急智生，他慌称自己是为了了一项重大的使命而急需到弟戎去，而这件事关系到整个法国、甚至全人类。既然他肩负着如此重大的使命，那又为什么不能在此列车上占有一席之地呢？

萨特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目的地——弟戎，而他以前只是个多余的人物，现在不是了，他是必然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类正盼望着他去拯救，而这恰恰就是他的存在理由。人类之所以没有堕落下去陷于野蛮而与猪狗为伍，就是因为有教士这样的圣徒在暗中顽强地与恶魔作战，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正是这样的圣徒。当萨特每天早晨醒来，看到大街上那些先生太太小姐们在安然无恙地行走，他便立刻想到，那是因为有一位圣徒在书房里写了整整一个通宵，因而人类获得了一天的“缓刑”。这位圣徒有朝一日将劳累而死，人类可能会因此而陷于愚昧，那时他萨特将接替这位圣徒的使命，继续为人类的生存而拼搏。总之，一方面由于词语本身的魅力，另一方面也因为萨特在现实面前的败退，这才促使他回到词语，从现实回到词语也就是从现实回到想象。他在词语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必然性、永恒、存在的理由（而这一切无非是基督教中上帝的别称而已）：他要通过词语来为人类效劳，同时证实他自己的存在并通过词语获得永恒。这就种下了他日后所谓的“文学神经症”的根源：“我生来就是写作的。”靠着词语，一个孤独的人忘却了他的孤独，一个无票的旅客获得了在此世界上的居住权，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成了一个主角，一个最卑微的人一跃而为最高贵者，一个无人需要的多余的人一下子成了全人类盼望的救星。

信仰的功能无非是给信仰者以安全感,借助于它,信仰者才有所依靠、感到踏实,遇到困难他才能以信仰来激励自己而不致于悲观失望,哪怕是荒谬的宗教迷信,只要信仰者心诚,它照样能使人感到幸福。同样,萨特的“神经症”也保护了他,“我的神经症保护了我,并通过写作给我以幸福”。困难和挫折对他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困难和挫折,而是圣灵对他的考验,是他达到死后永恒的跳板。萨特一方面是清醒的,因为他看到了当代人的异化,他在《厌恶》等作品中描写了当代人那种荒谬的,毫无理由的存在,并以其存在主义理论论证了由上帝不存在而来的人的自由和痛苦,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糊涂的,因为他这位自以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并没有真正摆脱上帝,他在心灵深处依然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如萨特认为,自在-自为的上帝是不存在的,然而作为词语之神的圣灵却悄悄成了他的上帝;他认为人生不可能、道德不可能,然而当他自以为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告诉人们这一点时,他的人生却变得可能了;存在主义认为人是被莫名其妙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而当萨特自以为是为写作而生的时候,他的人生却获得了一个目的;当萨特说,因为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关于死后升天,获救的说教都是骗人的鬼话,然而当萨特自以为为文学献生时,他的获救却悄悄得到了保证,因为他将通过词语而获得永恒。这就是萨特后来意识到的宗教思想。萨特在《圣热内:戏子与殉道者》一书中曾写道:“……天才并不是什么赠品,而是人们在绝望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一条脱身之路。”我们也可以说,萨特之所以选择写作,奉词语为上帝,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是他为了摆脱现实中的困境而创造出来的一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策。

五十年代初,萨特终于认清了这一诡计,抛弃了隐藏在他心

中数十年的圣灵：正是此圣灵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他的生活支柱，驱使他伏案写作，使他幸福的。他同时也经历了一场真正的信仰危机，这一次，他从作家的天堂坠入了凡人的尘世，使命，获救，未来……这些以前使他心安理得地从事写作的东西都土崩瓦解了。词语失去了魅力，就象萨特在现实中感到自己的无能一样，他也感到了词语的无能。对一个饥寒交迫的人来说，它不如一块面包和一件衣服，它也无回春之力去拯救“一个奄奄一息的小孩”。他以前视词语为圣物，视作家为圣徒，可他现在却认为作家是一个苦役犯；他这位无票的旅客现在面对查票员再也无言可对了，尤其是他已万念俱灰，他再也不想寻找什么理由来解释了。他怀疑他选择词语是否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正是这种沮丧的心情使他发出了斯旺的感叹“我竟为一个非我同类的女人糟蹋了我的一生！”他心中自问，耗费了那么多日日夜夜，涂满了那么多的稿纸，向市场抛出了一本又一本书，这一切是否值得？这与他1945年创办《现代》，撰写《什么是文学？》，意欲用存在主义来改造社会那种如猛虎下山，不可一世的磅礴气势恰成鲜明的对照。萨特正是在此阴沉的心境中写《词语》的，所以在他留下的所有文字中，该书的调子是最低的。萨特早在1954年即完成了该书的大部分，以后又修改过几次，直到1963年才终于一锤定音，从写作到出版历时十载，这正说明了他思想上的矛盾，旧的神话破灭了，词语的魔力解除了，然而剩下的余生又该如何安排呢？据他后来解释，《词语》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语气，一种是自责，另一种是对此自责的缓解。萨特之所以数易其稿而没有更早发表这部作品，恰恰是因为原来手稿中自责的语气太强了，强烈得大概可以使他再无勇气拿起笔来。然而，他否定了写作，批判了“高级教士的唯心主义”，可他除了写作还能干什么

呢？“没有理由因为这个不幸者从事写作而再去毁坏他的名声。”萨特缓解自责的用意无非是给他自己留出一条后路。

萨特既然在《词语》中对他的过去作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剩下一个问题便自然是“以后怎么办？”萨特缓解其自责的意图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作家“都是些苦役犯，而且文了身”，这表明萨特已默认他这位文了身的苦役犯只能终身与词语为伍了，因为他除此之外干不了别的。冷静之余，他又对词语作了重新认识，以前奉词语为上帝固然是荒唐的，然而把它看得一无是处也太过分了，他无可奈何地写道，“……我今天要写书，将来还要写书，书总是需要的，它多少有些用处……。”圣灵死了，可使命却深深地缝进了萨特的皮肉之中，一天不写作，伤口就会发痛，而如果写的过于随便，伤口也会发痛；词语虽然失去了神圣的色彩，可对它依然得严肃认真。既然“我的车在启动，我已发动了它”，那就听凭其惯性向前滑去吧。

恶梦醒来是早晨。早晨，这象征着一个开端。当一个人面对未来时，他必然带着他的童年，背负着社会存在加于他的东西。这一次，他以“文化的产物”的身份面对着未来。他并没有在悲观颓丧的心情中消沉下去，果然，我们在其后半生的笔墨生涯中看到的依然是一位文化斗士的形象：为了人类的和平事业，为了促进东西方对话，为了实现法国左派各团体的联合，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为了谴责法西斯势力以及种种侵略行径，他无不尽心竭力，起到了一个正直的西方知识分子所能起的作用，我们的确不能因为他没有发挥更大的实际作用而苛求于他了。

我们现在可以大致回答本文开头所提的问题了：萨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位以词语为人的自由而奋斗的词语大师（正因为离开词语便难以了解这位词语大师的艰难曲折而

又不平凡的一生，故而译者在《词语》之后又选择了《萨特著作目录及提要》以期能让读者一睹这位词语大师的风采）。萨特选择“词语”作为其童年自传的书名决不是偶然的，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与词语那种难分难解的关系。要弄清萨特的真面目，只有通过词语，舍此别无其他途径。萨特是一位富翁，因为他拥有一座用词语砌成的宫殿，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位无产者，因为他除了词语便一无所有。在词语的宫殿里，他既是自己的主人，又是词语的主宰，他就是上帝本人，他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任意调兵遣将，去完成他想象中的远征。然而一旦他离开词语这座宫殿，他又立刻成了一个普通的人。他在《词语》的最后写道，如果把他那“不可能实现的获救”，也就是把词语的神话递进道具商店，那么他就成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人。然而词语并非空无所指的东西，就象“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一样，我们也可以说，词语也总是对某物的词语。萨特的词语即是二十世纪人类生存状况的写照，其中响彻着自由的呐喊与和平的呼声，同时它也是对法西斯主义，对侵略、压迫，对人的异化的反抗，就此而言他又是一位伟人。事实上，萨特已经获得了他童年所幻想、而他写《词语》时又痛加谴责的永恒：人类是不会忘记曾为其和平与自由而奔波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的，此外，他的词语也将永远纠缠人类。

* * *

1986年10月，赵越胜先生约我给“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辑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翻译《词语》，当时我很高兴，因为我深知该书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我又有顾虑。首先这只是萨特的童年自传，只写到他十岁便嘎然而止了。虽然萨特在书中许诺要写他的青年自传，但他后来并没有履行诺言，只

是发表了几篇谈话才聊以弥补了他的缺憾。所以《词语》中并没有种种“奇闻轶事”；没有他那种愤世嫉俗的生活描写，没有他与博沃瓦的浪漫史，更没有他与博沃瓦、奥尔加的“三重奏”……而这些在相当程度上却是决定一本书是否能畅销的重要原因。后来多蒙赵先生来信指教才打消了我的顾虑，因为该丛书看重的是书的文化价值，不在乎能否畅销。其次，译者在几年前曾看到过一本台湾出的《词语》译本，所以若要重译，译者有一种与“二手货”打交道的感觉：《词语》已不是由我新摘采的果实了。为此，译者特意找来由谭逸翻译的《词语》，并对照原文看了一遍，发现该译本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其中有不少错译及漏译之处，而且其中的文字对大陆读者也不太习惯，译者这才感到有必要重新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个别地方曾参考过台译本，译者在此谨向谭逸，并同时向赵越胜先生深致谢意。

由于译者的理解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均十分有限，难以传达出原著的精义及风格，而其中的隐喻、双关等修辞手法一经译成中文，原来的韵味可能所剩无几了，罪在译者。错误及不当之处，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潘培庆

1987年7月29日